

目 录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与传统路径依赖超越	1
------------------------	---

京津冀协同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5
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对策研究	8
京津冀一体化下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11

高教动态

卓越的学术从哪儿来	14
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再聘7位一级教授	15
浙江高教：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15
“双高”对接“双一流”，广东全国率先建高水平大学群 ..	16
山东大学将改革薪酬制度，全面提升教师收入	18
最新版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炉	18
以色列三维透视创新创业教育	20
袁驷：推动“慕课”最大困难是缺想象力	22

“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与传统路径依赖超越

王洪才

“双一流”建设的初衷就是要解决传统机制造成的身份固化问题以便激发学术活力和创造性。因此，“双一流”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超越传统路径依赖，培植一个良性运作机制。

一、“双一流”建设应促进高教发展政策重心转移

我国高教发展基本上采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使办学资源向少数高校集中、大多数高校发展缺乏后劲。“重点建设”思维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路径依赖，造成了高校身份固化和利益固化问题，从而阻碍了学术良性竞争机制的形成。为此，“双一流”建设应该促进高教发展政策转变，使资源配置政策从效率转向公平。

（一）高等教育发展政策重心应从效率转向公平

过去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偏向于重点建设少数高校，以便使这些高校在短期内快速发展起来，这种“重点建设”的思维模式在大学发展早期是非常有效的，也是与当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形势相吻合的。但其效力就会出现递减效应，甚至出现阻碍大学健康发展的局面。如此就亟须改变大学的投入分配机制，从最初满足部分发展需求转向面向大多数的公平竞争机制的培育。

大学发展的关键并非取决于硬件设备条件，而是取决于软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依靠一种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高等教育要尊重学术基本规律，建立公平的学术竞争机制，使大学开展良性竞争。要做出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就必须付出持久不懈的努力，无法预先设定最终结果，不可能通过短期突击取得重大成果，这是学术基本规律。因此，只有改变传统的计划性资源分配体制，鼓励高校之间开展公平竞争，才能促进大学之间开展良性竞争。

（二）良性竞争机制的构成与运作

构建良性竞争机制必然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问题，它应是一种开放的制度设计，使得每所高校都有同台竞技的机会，并且都会因为自己的办学绩效获得相应的激励，从而使高校认为制度是公平的。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资助、评价、退出”机制。实事求是地说，选拔机制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首先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从而能够对大学的各种发展状况做出合理的解释，目前我们还缺乏这种解释能力。

退出机制的建设上也同样面临这一难题。甚至可以说，退出机制实际操作起来更难。因为一旦被列入了重点建设名单的大学一旦退出，则意味着名誉扫地，这对大学发展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监督过程中也存在科学合理的评价问题。“双一流”建设必须关注、克服“只对财务负责而不对学术本身负责”的状况。

二、“双一流”建设应当以育人为中心

（一）“重科研、轻教学”的路径依赖形成根源

大学办学的根本目的应当以育人为中心，科研应该服从于育人需要。但大学在具体办学过程中经常把科研与育人对立起来，其直接表现就是科研与教学的对立。这种路径依赖的根源就在于把科研与教学理解得过分简单化，似乎科研就是完成计划科研指标或发发文章，而教学就是对现成知识的传授，如此理解自然会使人轻视教学而重视科研。

（二）“双一流”建设必须树立一流的教学理念

“双一流”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术水平，但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只有做好科研才能提升学术水平，人们认为教学似乎与提升学术水平无关。这个观念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它把大学教学理解为简单的知识传授活动，没有意识到大学教学应该采用研讨的方式进行，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大学生的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源，也可以成为研究的主体。因此，必须进行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的创新。创新教学的核心内涵则是要树立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理念，将知识传授作为手段而不是目标。要采用研讨式教学模式，以问题探究为导向，在学生参与探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使教师就成为研究团队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学过程实际上就变成科研过程，教学也就成了一种学术探究活动。

如此，教师就必须研究真问题。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社会发展需要解答的问题；二是专业发展需要面临的问题；三是学生发展需要回答的问题。教师须改变落后的教学方式，对课程内容重新设计，避免无效课堂或无效教学。

（三）“双一流”建设应吸引教师更专注于人才培养

要把教师注意力吸引到人才培养上就必须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当然关键点就是教师评价制度改革，特别是教师晋升制度改革，也即要把教学业绩作为考核的重点。“双一流”只有作为一种战略举措，把人才培养作为发展重心的时候，师生关系和谐就成为大学办学、教学管理的工作重点。

师生关系变化折射出学术理念的转变。之前教师很大程度上把学术作为一种事业来对待，把学生作为事业的接班人来对待；而今天教师则倾向于把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来对待，学生则成了学徒工。这种转变将对学术原创性造成致命的打击。

三、“双一流”建设应当使大学真正反映社会需要

“双一流”建设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是应看其能否反映社会需要。

（一）学术创造性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的应答

学术的本质就是解答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然后把它们整理成系统知识，这也是学问的真正由来。学术的创造性是在解答真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创造性不仅是对人们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人们素养的考验。人们只有认真、慎重和设身处地思考问题，才可能找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二）国家必须建立保护学术创造的制度

在中国文化中，国家需要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国家需要代表一种整体利益。学术发展必须尊重个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国家必须赋予个体以创造的权利，必须建立有效的制度加以保护，否则个体的创造性就会被压抑。个体创造性被压抑，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四、“双一流”建设应摒弃管理主义思维模式

“双一流”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大学教授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如果人们的行为掉入到物质主义陷阱中，就会背离“双一流”建设的初衷。物质主义迷信物质刺激，认为只要增加物质刺激，就能够激发人的积极性。可以说，这种物质主义思维模式已经构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一）管理主义思维方式控制了学术发展

管理主义的出现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表现，其典型特征就是加强外部控制，强化物质激励措施，以量化评价为标尺，采用统一化管理，所以，管理主义往往是无视个性发展需求的，容易使学术发展失去自由和特色。

（二）强化中层管理，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作用

从现实情况看，学术委员会只在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而在绝大多数学校仍然只扮演一个花瓶的角色。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行政主导已经成为习惯，学术话语很难发挥作用。

从规范化的角度看，学术委员会能否受到重视就在于高校是否有明确的授权并建立了相应权力使用规则。大学的有效运作需要遵循中位原则，需要扩大学术权力的作用空间。

五、“双一流”建设要与现代大学制度推进相伴而行

“双一流”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学术卓越，故需要建立科学的机制体制作为保障，现代大学制度推进理应承担为“双一流”建设保驾护航的责任。因此，“双一流”建设必须坚持去行政化的路线，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在我国，大学行政化趋势已经积重难返，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要想超越它就必须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力度。

（一）“双一流”建设应以现代大学制度为支撑

原则上讲，“双一流”建设只有遵循现代大学制度原理才能成功。但从现实情

况看，现代大学制度也处于构建状态中，还无法为“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意味着，“双一流”建设与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是一个共生共长的互生关系，即“双一流”建设为大力推进现代大学制度探索提供了机遇，而现代大学制度探索成果将促进“双一流”建设。而大学教授参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才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进的保障。

（二）“双一流”建设应超越传统行政化逻辑

“双一流”建设决策作为一项国家行为，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主导角色，而且在日后建设中，政府仍将发挥主导作用。但“双一流”建设最终需要落实到各个大学和每个学者的具体实践中，因此，如果不充分发挥大学的主动性和学者的主动性是不可想象的。而政府的主导作用往往难以充分发挥大学和学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两者之间必须获得一个平衡。为此，我国亟须推进管办评分离制度，避免大学和学者始终处于依附性地位。

从本质上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要跳出大学行政化轨道，建立与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要超越传统行政化的逻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行政化逻辑是计划体制运行长期累积的结果。行政化与资源的集中配置、计划任务要求、量化考核、行政管理手段等是共生的，甚至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关系，它们集体构成了传统的路径依赖。所以，要超越传统路径依赖，就必须各个击破，但从根本上说则是要高举现代大学的旗帜，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加强学术本位的大学文化建设，同时要把学术创新效果作为检验大学制度建设成效的杠杆并丰富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因而，“双一流”建设与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只有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双一流”建设才能顺利推进，否则就无法实现“双一流”建设的初衷。

摘编自《中国高等教育》 2017 年 7 月

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王福建 孙继红

一、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一）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态势异常明显

我们从机构数量与质量、规模与结构、投入与产出等方面来衡量，作为客观描述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维度。数据显示，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占有上存在较大差距。

1、机构数量与质量

截止2016年，全国共有本专科高校2595所，京津冀拥有266所，占全国的10.25%。其中北京市本专科高校共有91所，天津市本专科高校共有55所，河北省本专科高校共有120所，单纯从高校总数看，河北省最多，其次是北京市，天津市最少。从区域整体看，整体上京津冀高水平高校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占有巨大优势，处于领先地位。北京市拥有8所“985”，占全国总数26%，同时还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211”工程高校；天津市拥有“985”工程高校2所，占全国的拥有的5%，“211”工程高校数量占全国的4%，河北省则没有“985”工程高校，仅有1所“211”工程高校，所在地还在天津市。

2、规模与结构

从各学历层次在校生规模看，河北省2015年本专硕博在校生合计121万人，在京津冀中数量最多，其次是北京市91万人，天津市最少仅有57万人。具体到各学历层次看，北京市博士在校生人数最多，其次是天津市，河北省博士在校生人数最少，仅有2719人。硕士在校生人数，北京市人数最多，其次是天津市，河北省人数最少。再以每十万人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指标看，2014年北京市每十万人人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全国排第1位，天津市仅次于北京市，河北省则不及全国平均水平2488人。

3、高等教育投入

在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方面，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也有较大差距。首先看教育经费支出，目前京津冀地方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总量以河北省最多，其次是北京市，天津市最少。高等教育专任教师结构差距明显，2015年，河北省高校专任教师数量最多，其次是北京，天津最少。但高校专任教师在职称机构上有明显差距。北京市高校专任教师以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为主，天津市高校专任教师职称结构以副高和中级为主，河北省高校与天津市高校比例结构类似。

（二）京津冀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2015 年京津冀 GDP 总量，北京市最高，但是人均 GDP 天津市在京津冀地区排第一位，河北省比全国人均水平低 9737 元；按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看，北京市第三产业占比排京津冀地区第一位，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是河北省的近 2 倍，是天津市的 1.5 倍。北京市和天津市与河北省相比，第一产业增加值差距明显。

2、产业发展具有较强互补性

从总体发展水平看，北京市远高于津冀，各分项指数均高于津冀，核心地位稳固，转型升级有坚实基础。天津市创新力上升较快，凝聚力日益增强，加快转型升级和增强辐射力是必然选择。河北省支撑力指数最高，创新力提高最快，但凝聚力不足。因此，北京市应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核心引领带动作用；天津市应加快创新驱动转型步伐，并提升区域合作辐射力；河北省则需要加快转型升级和城镇化步伐，着力改善民生以提升集聚效应。

二、影响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各自为政，缺乏系统性协同机制

当前，京津冀的高等教育政策依其各自行政区划自成系统，国家还未从战略高度对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进行统筹布局，教育部尚未出台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的指导意见，各省市在制定本地高等教育发展政策时，依然从自身出发，自说自话，没有一个建立在京津冀协调发展宏观层面的沟通协调机制。从目前来看，区域性的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机制还没有完全建成，缺乏常态化沟通与协作机制，政府对于协同合作缺乏相应的激励策略，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政策保障和效能作用。

（二）本位主义、行政壁垒阻碍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长期以来北京作为首都、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明显优于河北省，占有更多优质高校和科研资源，河北省各项发展则长期落后。北京市、天津市在高校外迁方面仅能对市属高校施加影响，而对部属高校仅有“鼓励”等缺乏行政推动力手段。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需要跨越的最大障碍是三省市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行政管辖权限。需要北京市、天津市高校破除“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制定相应激励措施以主动“赶考”的积极态度，来促进和实现区域内资源的有序流动。

（三）区域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契合度较低

京津冀地区尽管高教资源丰富，雄踞全国首位，但并未像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高教资源那样与区域经济环境之间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京津冀高校特别是部属重点高校在自身办学定位时往往忽视了为京津冀区域发展服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无法与区域发展水平、速度和规模相契合，难以完全满足区域发展对各种类型人才的需求，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没能充分发挥人才的支撑作用，同时区域高等

教育发挥引领经济发展的显示度还很弱。

三、推动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创新策略

（一）整体规划，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协同一体化体系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既是问题导向，又是目标导向，要从解决突出问题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差距悬殊等入手，由国家层面委托中央相关部委进行整体规划，构建三省市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一体化体系，通过探索新机制、新模式、新路径，最终实现三省市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是核心，协同是关键，要对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基本关系进行长期监测，把握三省市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总体进程和发展趋势。

（二）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官方协调机制

作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了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就需要由中央层面例如教育部做召集人，联合三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辖区内部属高校，建立促进高等教育协同的官方协同机制，制定科学长远的发展战略或规划，定期会商相关议题，实行绩效目标考核。以评估为抓手，制定相应的评估体系，引入市场激励作用，有效调配区域内教育资源，促进均衡配置。

（三）以合作共建模式推动实质性发展

为扎实有效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三省市需借鉴其他领域合作的成功范例，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建。合作共建模式除了以往的高校之间的校校协同、校校联盟之外，还应增加更多的校企合作协同、产教融合协同、跨省域政府与高校合作、高校与产业园区（社区）合作等等。协同范围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将溢出效应拓展到整个京津冀范围内。

（四）进一步深化院校联盟建设

除了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模式，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应根据高校人才培养对应的产业，吸引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加入到合作中来，以高校-企业-高校的共建模式开展合作，企业可以牵头与高校共同实现产业链前端的产品研发与产业链后端的终端制造，从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水平，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高校在参与企业共建的过程中融入到产业经济建设中，也能提升与产业的协同度。

（五）强化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性发展

建立京津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监测系统，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研服务与区域经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业转型升级技术需求作为两个重要方面进行监测，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和区域产业经济发展重点监测子系统。通过监测平台监测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经济运行状态，发现一些相对稳定的、长期的影响因素，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为重大战略性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摘编自《当代教育科学》2017年第8期

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对策研究

齐艳杰 薛彦华

“京津冀一体化”既是一个政治术语，也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布局。它包括知识社会、市场经济、意识形态、通讯技术、人员、资本的实质性、虚拟性流动、互补和共享。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文化、价值观形成及人才内聚、外溢的主要驱动力，“高等教育一体化”被作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工具或策略而触发，并逐渐取得存在的合法性。但“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作为一项教育活动，与其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需要在当前“京津冀一体化”理性化深入的关键时期得以确定和解决。

一、背景与设想：理性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

2015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通过在交通运输、产业结构、财税金融、公共服务、文化教育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实现协同创新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 年 10 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四提“京津冀”教育一体化前景可期，自此“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作为“京津冀经济、文化、人力资本一体化”的一项工具或策略被动触发。“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提出，作为“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衍生产品，通过高等教育促进人口流动的延伸效应，倒逼城市功能的重新布局和建构。要切实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保障“高等教育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发挥，我们认为有必要制定国家层面的“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实施方案”。

二、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中存在问题

（一）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功能、定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京津冀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设计动因并非基于高等教育系统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或任务，而是基于社会性人口结构调整的需要。。这就导致京、津、冀三地在“高等教育一体化”的目标、任务、价值取向等方面缺乏统一性、共存性。因此，在“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中即便不能强制要求、规定、表述其在目的、功能和传递过程中的一致性，也需要设置一定的特征和参数来描述“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对京、津、冀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利性、内聚性和可持续性。

（二）一体化进程中的地理疆界与行政壁垒问题。京、津、冀高等教育相关部门和学校对“一体化”进行投资的驱动力，由于受保护性地方法规、行政区划的壁垒，城市功能分区、经济发展导向的制约，在其“一体化”政策的制定、项目开发、实施等方面呈现意愿、期待、努力程度及成效上的差异。因此，结合“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需求，三地必须建立一系列超越“疆域”的一致性目标、配套政策、

监测系统，评估系统，实质性促进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有效融合。否则，“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很有可能成为对“京津冀一体化”项目中高等教育领域一体化需求的临时性、碎片化回应。

（三）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协同与整体提升问题。京津冀应将由经济动因出发的“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工具行动转变为以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为目标的教育战略联盟实施方案，通过京、津、冀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层次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人力资本的自主流入、流出。从而提升三地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度依赖，解决“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问题的关键。因此，三地有必要按高等教育要素及资源优势，在“一体化”的动因和价值取向一致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层面、方式的路径、策略推动一体化进程。

三、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内容与路径

（一）政府推动与科学建制：推进一体化政策、机制的系统性、科学性

1. 政府引导：推进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充分参与。京、津、冀三地政府、院校对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定位、功能、价值的理解是其形成“一体化”制度、策略、项目的基础。国家通过三个层面的设计，第一，成立国家层面的、高规格的“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领导小组”；第二，制定“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专题会议制度；第三，以高校为依托，以相关政府行政部门为权利实体机构，建立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智库平台，定岗定编，责任到人。引导三地政府、高校及相关利益群体就“高等教育一体化”问题进行对话与协作，获得“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持续的内在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科学的实施路径。

2. 科学建制：构建政策搜集与评价数据检测平台。切实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需要从三地高等教育事业的特征、进度、生态环境的实践调查出发，从高等教育要素诸如师资储备、学生学习成果、教育空间资源，及学分管理、学位授予等在京、津、冀三地交流、共享、互补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着手，构建“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政策、制度收集、积累与评价的数据检测平台，形成一套系统的、连续的“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政策触发、设定、抉择、合法化、执行与改进机制。

（二）教育资源跨府际调配：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实质共享和有效使用

1. 推动高等学校合作办学，有效促进区域教育资源跨府际调配、互补。破除京津冀区域内教育资源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阻碍，一方面，通过建立高等学校特色项目合作联盟，依据两市一省各自在城市功能定位与分工以及区域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成熟、储备程度，重新布局、整合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专业、层次、规模优势。形成一条从“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天津市）—“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河北省）、从上游到下游的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教育优先的一体化线路。一方面，通过建立高等学校一体化对口支援计划，校址搬迁、

建立分校等合作办学形式，从教育理念、教育管理制度、教育方式、方法等多个方面，构建强、弱高校教育资源帮扶、互补计划，扩大差异性教育资源的流动空间，提高高等教育一体化项目的质量效益。

2. 搭建优质教育资源控制平台：促进教育资源的有效流动、使用。通过搭建国家、地方、高校三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流动控制、评估平台，促进高等教育资源流动的方向性、规范性、畅通性和有效性。通过优质资源流动控制、评估平台，在京津冀社会发展需要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三地府际、校际间高等教育权力的分工、要素的流向进行实时的监测，运用政策倾斜、制度引导、教学、科研、产业项目合作等形式帮助高等教育资源打破空间、壁垒，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自主流入、流出，实现三地高等教育资源的实质性共享。

（三）教育基本要素重组：促进整体改革与系统推进

1. 设计跨领域、跨区域的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课程模块，理性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别和融合。两市一省在知识生产、科技创新前提下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是京津冀一体化核心任务。根据京津冀一体化三地的功能、定位，依据课程的内在逻辑结构，开发既具有职业教育性质，能为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的职业性课程模块，又要能实现本科教育、自由教育目标，激发学生积极思考人生、价值观，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思维、合作意识、人文底蕴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模块，科学、理性的推进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别和融合。

2. 构建京津冀高等学校教与学绩效与质量监控体系，创新高等教育要素组合方式，提升区域高等教育质量。首先，建立京津冀范围内高等学校教师职业发展协同联盟，教师通过联盟平台内的跨校、跨区域任教、研修，提升教育教学与科研质量。其次，按照一定的学位授予标准，建立三地各专业方向的学位认证对等标准，制定学生就业资质对等条约。再次，制定京津冀高校学分互认制度框架，将三地高校特色和优势学科进行整合，以专业课程合作的教学形式，重组专业课程模块、划分学分结构。

“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是全力打造以目的性、合作性和区域性为特色的京津冀高等教育新体系，推动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发展。

摘编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京津冀一体化下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易金生

一、京津冀一体化对地方本科高校及其学科专业结构提出的新要求

京津冀一体化秉承发展和创新的理念、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以产业、项目建设为载体、以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的人才提供知识技术支持为条件逐步推进而完成的。京津冀一体化实现的过程是京津冀产业发展变化的过程，京津冀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人才结构的变化，人才结构的变化传导到高等学校就引起学科专业结构的变化：京津冀一体化实现的过程也是京津冀行政管理方式、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过程，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的变化也必然引起相关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引起人才结构的变化，进而要求高等教育相应的学科专业结构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则要调整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需求量不大、专业设置雷同的学科专业。

二、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 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及其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缺乏协调

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属于不同行政区划，既无统一行政管理机构，也无统一财政收支，虽然国家层面上提出了京津冀三个行政区划的一体化，但是对隶属于京津冀三个不同行政区划的各地方本科高校而言，相互之间没有建立起沟通协调机制，这些地方本科高校的封闭办学依然如故，尚未形成把这些地方本科高校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规划、对学科专业进行整体布局调整的局面。京津冀一体化要求京津冀三个省级行政区划的地方本科院校打破行政壁垒，建立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及其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协调一致、信息资源共享、利益互利互惠的机制。

(二) 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贪大求全的思路导致学科专业设置趋同性严重

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存在贪大求全的现象，即规模求大、学科求全、层次求高，单科性院校想发展成为多科性院校，多科性院校想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学院想升格为大学等。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本科院校设置的学科专业比较雷同，如数学、外语、计算机、法律等学科专业。就外语专业而言，京津冀几乎所有本科院校都设置了，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所不同的只剩下毕业院校名称不同而已，同质化倾向极其严重。

(三) 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衔接不紧密

京津冀的主导产业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金融服务、高端旅游等，这些产业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对其它产业和整个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强带动作用，相应地对相关人才的要求较高、需求量也较大；由于交通、生态环境保护是京津冀率先突破的领域，所以，对这些专业的毕业生需求量也比较大。但这些专业呈现“少而不强、有而不优”的局面，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

有效满足京津冀一体化的要求。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的结构与京津冀产业结构不相适应，与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失调，这种不合理的学科专业结构势必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加剧了大学生就业困难，还造成了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因为缺乏高质量人才支撑导致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难以顺利推进。

三、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对策措施

(一) 加强对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学科专业发展的宏观规划工作

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建立一个协调联络机构，负责对京津冀地方本科院校及其学科专业结构进行总体规划，总体规划制订公布后，各个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科专业就必须以总体规划为纲进行调整。这份总体规划，不仅要在宏观上能够促进学科专业结构满足京津冀经济社会的整体需求，而且在微观上要促进这些学科专业满足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总体规划通过定期公布京津冀学科专业布点情况、不同学科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公布人才市场紧缺专业和滞销专业等形式，对不同学科专业进行调控；总体规划还要涵盖学科专业建设指南，学科专业建设指南就是以学科专业建设的形式，促进京津冀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的优势、特色发展，达到有针对性的分类指导的目的。

(二) 构建学科专业群战略，提升服务京津冀的能力

学科群是指围绕一个具体的目标和任务，由若干个同类学科或跨门类学科集合而成。专业群是指由若干个相近或相关的专业或专业方向集约而成的专业集群。要解决好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学科专业群建设问题，需要结合高校传统、现实资源、社会需求和科学规律，以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以京津冀主导产业的发展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培养京津冀不同企业、不同行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在办好优势或特色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协同，形成学科交叉渗透的学科专业群，通过学科专业群的整体发展，使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与京津冀产业结构、产业集群人才需求特点相匹配，提升服务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 建立紧密对接京津冀产业链的学科专业结构

对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与京津冀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学科专业，在与京津冀互动中不断强化和壮大学科专业实力，实现与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发展，这也是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开拓办学空间、获得办学资源、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选择。因此，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应该根据交通、生态环境保护等京津冀优先发展产业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京津冀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这些产业链有关岗位的实际需求设置调整交通、生物、环境保护、新能源新材料等学科专业。实现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的学科群对接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专业群对接交通、生态环境保护等产业链，建立紧密对接京津冀产业链的学科专业结构，提高高校服务京津冀经济社会的能力。

集中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资源，加快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的交通、生态、环境保护等学科专业的配套设施、设备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提高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在交通、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新材料等学科的集中度，提升这些学科专业的竞争力与服务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四)实施产学合作战略，促进学科专业良性快速发展

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应该实施产学合作战略，主动与地方企业联系，高校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科研能力，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根据企业的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采取顶岗实习、订单式培养等多种形式，力争实现高校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人才培养规格与工作岗位要求对接，培养出适合企业用人标准、满足企业需要的高质量人才，通过与企业的无缝对接反向推动京津冀地方本科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促进学科专业的良性发展。

(五)建立学科专业的检查评估制度

通过确定学科专业评估程序、评估标准、评估方法，定期开展对学科专业的检查评估的方式，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对于被检查评估的所有学科专业，其评估结果都要向社会公布，对于新设置的专业要加强指导，对办学条件未达到要求的学科专业予以警告，督促其达到相应的办学条件要求；对就业率较低的学科专业勒令其限期整改、甚至取消其专业招生资格；对不同的学科专业的情况都要定期向社会发布，公布其特色、课程设置、师资水平、就业面向、毕业生就业率等。

摘编自《教育导刊》2017年2月

卓越的学术从哪儿来

北大校长林建华发文回顾北大的发展，并论述“双一流”建设的关键。认为国家启动大学的“双一流”计划，希望以学科为主线，通过加大投入、推进改革，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准和竞争力，其核心是学科的建设，产生卓越的学术和教育。

他认为**卓越的学术机构最重要的应当是学者和氛围**。开展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拓展人类的认识边界，是要培养人，以保持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在前行的路上，既需要学者的视野、胸怀、勇气和担当，还需要优良的科研环境、完善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学术氛围。

卓越的学术机构，要聚集最优秀的学者，并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我曾与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交谈，他认为，聚集最好的学者，并让他们一起工作和交流就可以产生最好的学术。思想上的碰撞，会产生新的学术，使大家都受益。良好学术氛围以及和谐共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是很值得赞赏和珍惜的。

卓越的学术机构，要涵育学术，并激励青年学者，使他们更好成长。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曾讲：不仅要依靠少数科学家的才能，而且要不断吸收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帮助他们熟悉科学研究方法，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青年人的贡献和成长，会使新的血液和新的思想源源不断地进入科学研究。

“985 工程”建设中，北大始终坚持“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交叉学科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的思路，陆续新建了一些像国发院这样的学术机构。国际数学研究中心通过环境和支撑，使学者潜心研究，促进青年学者快速成长。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鼓励合作和协同文化，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文社科研究院（文研院）要在人文社科领域“涵育学术，激活思想”。**这些研究机构在小范围内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但他们的学术标准，对卓越学术的追求，**带动了学校的发展**，也促使了其他院系的进步。

“双一流”和学科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释放创造潜力，使“近者悦，远者来”，聚集最优秀的人才，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0月09日第5版

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再聘 7 位一级教授

10 月 11 日，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学者暨第二批第三批一级教授、第三批荣誉一级教授聘任（授予）仪式在京举行。著名法学家王利明，著名金融学家吴晓球等 7 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荣晋“一级教授”岗位，著名新闻传播学者陈力丹等 3 位教授获评“荣誉一级教授”，至此，该校“一级教授”“荣誉一级教授”已达 46 人。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聘任首批“杰出学者”413 人，计划设 600 个左右“杰出学者”岗位，覆盖 30%左右的优秀教师，给予相应津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级岗位聘用“坚持学术水平、学术贡献与学科建设相统一”的原则。一级岗位教授的评选是人民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率先改革、先试先行的典型范例，是人民大学区别于其他高校、研究机构独特的制度优势，是激励和引导教师在学术科研和教学工作中追求卓越的重要举措。

教授一级岗位聘用工作，是学校赋予杰出学者的崇高荣誉，旨在激励受聘者不断去增大它的价值。同时，各位一级岗位教授也是年轻教师学习的楷模和发展的目标，对年轻教师产生着实实在在的激励；一级岗位教授也要承担着比普通教授更多的学术责任和学校期望。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一级岗位教授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人文精神的弘扬做了大量工作，承担更大的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的责任；此外，还要敢于正视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以自己的学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帮助社会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为中华民族精神秩序的建构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荣誉一级教授、杰出学者聘任（授予）工作，不仅是学校尊重人文社会科学规律，结合国情、校情，培育大师、激励和吸引人才所进行的一项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且是学校立足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现状，发挥学科特色和制度优势，推进双一流建设工作的新起点。

摘编自 中国社会科学网

浙江高教：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长期以来，浙江的高等教育实力都与其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但不久前国家“双一流”名单正式公布，中国美术学院和宁波大学上榜，浙江有了 3 所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一改浙江高教疲弱之态。

不容忽视的是，更多的浙江省属高校近年来发展迅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象，已然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在经历 1952 年院系调整，布局之伤后，近年浙江通过重点建设，形成崛起之势，补足本省薄弱的高等教育短板。按照浙江省的总体规划 and 目标，到 2020 年，浙江全省高等教育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列全国省（区、市）前 6 位，若干所高校在全国同层次、同类型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省、市属高校有 20 个以上的一级学科进入全国前 10%、100 个以上的一级学科进入全国前 30%。高层次人才增量列全国前 5 位，若干教学科研团队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

浙江高等教育正形成**一超多强，百花齐放**的格局。在大量的资源投入和地域优势下，浙江省高校近开始呈现蓬勃的发展势头，不仅浙江大学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省属高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也都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浙江省属高校在科研上屡屡突破，同时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上也收获颇丰，对高层次人才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对应的，浙江高校近年来招生分数的连年高涨，生源质量持续攀升。

摘编自 搜狐教育

“双高”对接“双一流”，广东全国率先建高水平大学群

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出炉，广东占据 5 校 18 学科的席位。今年广东已安排 6 亿元支持 5 所入选高校建设“双一流”。

对接国家“双一流”，广东下了一步“先手棋”，再次走在全国前列。2015 年 4 月以来，广东率先在全国启动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下称“双高”）建设，它是主动对接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重大战略的前瞻性举措，也是推动高等院校有力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

日前，省教育厅厅长景李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双高”就是“双一流”的后备军和预备队。广东将坚持以“双高”建设为抓手，对接国家“双一流”政策，努力建设更多高水平大学和学科，为广东乃至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全国率先

早在 2015 年 4 月，广东率先在全国启动“双高”建设，以“双高”对接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加速输出高水平人才、成果和新型研发机构。就此，广东高等教育新一轮大发展拉开序幕。这一率先举措，令 17 所参建高校兴奋不已。

投入力度、改革力度之大。除了获得三年近 300 亿元的大手笔投入，还有一系列在全国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政策，广东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

投入方面，省财政通过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提高生均拨款标准、引导地市政府加大专项支持力度等超常规举措，加大对“双高”建设的投入力度。2015 年-2017 年安排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 50 亿元；高水平大学生均定额拨款标准从 1 万元提高到 1.2 万元等。

改革方面，不断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加强内部治理体系改革，出台一系列在全国领先的创新性政策措施，不断扩大和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为高等教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聚集人才

高水平大学建设，关键是要抓住人才队伍建设这一“牛鼻子”。

广东出台《高水平大学建设人事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华南师范大学等 5 所高校率先试点，启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出台《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 24 条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改革措施，在经费使用、职称评审、住房保障、出入境手续办理等方面制定了具体的人才激励措施。

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并举也是广东“双高”建设的重要抓手。

为广纳贤才，2015 年以来广东省通过组织省内高校赴美国哈佛大学等举办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会，使参建高校不断加大人才引育力度，高层次人才数量和质量快速增长。截至 2016 年底，“双高”参建高校两年新增国家级人才 545 人，较建设初期基本翻番。

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高校身体力行。在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广东各高校呈现百花齐放的盛况。

激发活力

“双高”建设以来，广东省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大力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制订了一系列在全国领先具有创新性的改革政策，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譬如，出台《高水平大学建设人事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提出“五个下放”、“二十个自主”；出台《关于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创新高校科研组织管理与科研评价考核的 9 条措施；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 24 条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改革措施；出台《关于广东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等。

参建高校也积极主动作为，对接政策红利。“双高”建设以来，各参建高校新制订或修订规章制度 413 项，全面推进内部治理、人事制度、资源配置、经费使用等制度改革，通过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扩大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等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校地合作

“双高”建设不仅强调科研创新，同样重视学以致用，发挥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

在开展社会服务方面，高水平大学参建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产学研基地等平台近 500 个，服务企业超过 2000 家，并在支撑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卫生强省”、南方教育高地、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高校也积极发挥智库和孵化器的作用。

未来走向

广东将对高水平大学参建高校进行动态调整，即将对参建高校建设成效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目前高水平大学建设参建高校奖优罚劣、动态调整，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和服务我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列一批高水平大学。

摘编自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山东大学将改革薪酬制度，全面提升教师收入

在近日召开的山东大学第二届齐鲁青年论坛上，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表示，将稳步实施薪酬制度改革，全面提升教师收入水平，尤其是提高杰出人才的薪酬收入水平，建立起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适应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薪酬分配体系。

她具体谈到，山东大学将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为教师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和精准到位的政策指导；下大力气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做好子女入学、住房补贴、医疗服务、社会保险等惠民工作。同时，切实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不断提升管理效能，为各类人才提供精准快捷、细致周到的服务保障。

摘编自 中青在线

最新版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出炉

近日，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授权人民网正式发布最新版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这是继 2016 年首次发布以来，我国第二次发布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其中，《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报告》和《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报告》均为首次发布。此次发布的系列质量报告，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会同厦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专家团队联合研制，包括本科教育、工程教育、新建本科和民

办本科共 4 本专题报告，主题鲜明，各有侧重。

本科教育：“体量”世界最大，质量稳步提升。《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是我国首份专题性的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报告中称，中国本科教育“体量”世界最大，质量稳步提升，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分层分类培养多样化人才等方面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根据报告，截至 2016 年，我国普通高校达到 2596 所，普通本科高校达到 1237 所，本科院校成为高校增长最重要的主力军。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规模 405 万，在校生规模突破 1613 万，普通本科毕业生规模突破 374 万，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本科毕业生已经成为我国新增人力资源的最重要发动机，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

报告指出，本科教育办学条件改善显著，整体上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打造一流本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截至 2015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支出 18144 元，是 2005 年 5376 元的 3.4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2%。教师数量持续增长，1995-2015 年，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教职工总数从 106.5 万人增加到 236.9 万人，跃居世界第一。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总体上看，一流本科教育建设卓有成就，已经在路上。

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本科教育离人民群众要求接受越来越好的优质本科教育的需求仍存在差距，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中仍存在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任重道远，需要继续发力。

工程教育：主动“转型升级”，跻身世界舞台。《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工程教育主动“转型升级”，变革发展，建成了层次分明、类型多样、专业齐全、区域匹配的世界最大工程教育供给体系。数据显示，中国普通高校工科专业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稳居世界首位，数量比紧随其后的俄罗斯、美国等国高出 3-5 倍。报告中特别指出，2016 年 6 月，中国成为国际本科工程学位权威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中国工程教育在内涵发展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跟随者变成参与者、制定者，人才培养质量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可。2015 年，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与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共认证中心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和《开展中俄联合认证的合作协议》，揭开了用中国专家、中国标准、中国模式对国外高等教育进行认证的序幕，标志着中国模式和质量标准开始走向国际舞台。报告对 1000 多所高校近 5 年的教学基本状态数据、300 多个工科专业的自评报告和认证报告，以及《中国制造 2025》未来 10 年工程教育人才需求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目前工科毕业生供给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专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工科毕业生供给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和行业需求，人才培养链与国家创新链、产业链对接有待进一步增强。

新建本科院校：在转向“应用型大学”的道路上行进。《中国新建本科院校质量报告》是在连续五年发布《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的基础上，对

新建本科院校办学质量和转型发展的首次大检查、大展示、大交流。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已有新建本科院校678所，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1219所的55.6%，新建本科院校占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极大地缓解了人民群众“上大学难”的问题，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奠定了基础。“十二五”时期，新建本科院校设置逐渐向中西部、非省会城市倾斜，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有58.7%的新增院校位于非省会城市。报告进一步指出，新建本科院校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擎起转型发展的大旗，立足地方，向应用型的办学定位转变。根据转型升级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建本科院校建设了一批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数据显示，2000年新建本科院校新设本科专业56个，2005年增长到856个，2013年达到1156个。专业建设成果明显，新建本科的就业率达到89.5%，其中电子封装技术、房地产经营管理等15种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呈现出“部分院校已具备新型应用型大学的雏形，成为应用型本科的领跑者；更多的院校正在应用型道路上行进，还有一批应用型大学正在萌芽、成长”的繁荣景象，可以说新建本科院校转型正在路上。

民办本科教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办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是首份专题性的民办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根据报告，截至2016年5月，全国共有本科高校1236所，其中民办本科高校417所，占比超过三成。民办本科教育最初仅作为公立高等教育的有益补充，如今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民办本科院校不断加大投入，其整体办学条件极大改善。民办本科教育的社会满意度不断提高。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民办本科教育取得的办学成果有目共睹，但其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民办本科院校在整体办学方面存在着惯性规模扩张与生源持续下降、追逐社会热点与内涵建设不足、教师年轻力盛与缺乏专业领军、生存发展心切与缺少系统规划等四个突出矛盾，亟待改进和完善。

摘编自 人民网-教育频道

以色列三维透视创新创业教育

以色列高校十分重视创业教育，采取多种方式促进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的培养。据统计，以色列10%以上的本科生和30%以上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通过创业教育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以色列5000余家初创企业中很多都是高校毕业生创办的。

从平台建设到学科改革，再到项目设置，以色列高校全方位促进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鼓励更多大学生加入创新创业队伍。

发现创新创业新星

在以色列的高校中，创业中心为大学生提供了交流、合作、发展的平台，不但有相关课程、实战指导，而且还为优秀创业项目提供奖励和资金支持。创业中心的宗旨是，为企业家和创业者提供实际可行的专业指导，帮助他们成功设立新公司。

以色列理工学院创业中心（BEC）向全校学生提供各类学术课程，举办工作坊和竞赛等，与创业初期的学生企业家合作，为他们提供开办未来大型科技初创企业的工具和专业知识。此外，该创业中心还帮助学生打通行业渠道，开展社交聚会、展示活动、工作坊和行业挑战赛。

特拉维夫大学创业中心（Star Tau）成立于 2009 年，是特拉维夫大学的学生创办的，为学校的初期创业者提供支持。在随后短短几年，该中心迅速发展成以色列最大、最活跃的非营利创业中心，共有 300 多名导师，为 3000 多名校友提供课程。该中心为各个领域的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服务，包括互联网、生物技术、移动应用、专利、医疗器械等。

创业中心提供了导师课程、课堂体验、搭建关系网及商业资源等，帮助私营企业家、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及企业与学术机构和公共领域对接，提供业务开发、市场营销、法律咨询等服务。

此外，以色列全国性的创新创业活动和比赛，也为大学生创业者们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交流和展示。“Technion3DS”是一个高强度的、注重实践的三天工作坊。学生从最初的创意到向投资商展示，并得到全面指导。在丰富多元的工作坊中，学生可以亲身实践，在动手中学习。活动中，工作坊也能够将学生联系起来，促成多家企业的创立。

专注创业实践技能

经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赫兹利亚跨学科学院正式开设了“创业学士学位课程”，面向有兴趣建立创新企业或设立创新项目的学生招生。“创业学士学位课程”不但包括了传统的法律法规、财务等商务类课程，而且还有很多实践方面的创新。例如，“一手创业”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案例研究、互动课堂讨论、客座演讲和教育旅行，探索创业和创业管理的世界；“技术革新与创新”课程帮助学生了解业务创新和技术进步引发的机遇和制约；“互联网时代统计”课程引入了社会科学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并延伸到“大数据”时代所需的其他概念。

塑造创新创业精神

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是创业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创新创业中心注重促进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并在这些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该创新创业中心的目标是在贝尔谢巴-内盖夫地区和全以色列创造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新生态

系统，目的是促进本·古里安大学的创业与创新；通过大型活动、讲座、社区活动等多个项目，促进企业家精神领域的教学和研究。

这些都是对创新、科技和创业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的回应。在赫兹利亚跨学科学院“创业学士学位课程”中，“创造力与思想心理学”课程为学生普及认知、发展趋势、生物学视角、个性和动机等心理学知识，为增强学生的思想和创造力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丰富学生对于创业者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认知。

摘编自 中国社会科学网

袁驷：推动“慕课”最大困难是缺想象力

近日，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教学研讨会暨 2017 雨课堂峰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袁驷表示，推动“慕课”（MOOC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最大的困难不是政府不重视，不是老师们观念滞后，也不是经费问题，而是缺乏想象力。前沿信息技术和教育理念的交叉创新与跨界融合正成为当今高等教育领域的机遇和挑战。在线教育不仅是一个教学平台，也是一个研究平台、一个实验平台、一个创新平台。它承载着教育教学的创新，包括新理念、新方式、新方法、新形态乃至新体系。“这次国际教育教学改革，中国要成为领跑者里的一员，而不是后面的追随者，就要非常及时地把课程建立起来，平台搭建起来，整个研究体系、创新体系都要建立起来。”袁驷表示。在过去五年里，慕课、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育模式在国内外正逐步向常态化发展。2013 年 10 月清华大学推出了全球第一个中文慕课平台——学堂在线。2014 年 4 月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正式设立，现在已经支持了将近 250 项国内外的有关研究课题，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在线教育学术研究和成果交流平台。“慕课”现在的问题不是政府不重视，实际上政府很重视；也不是老师没有动力，实际上一旦教师认识到它的机遇和发展前景，自身动力十分强劲；更不是没有经费，很多机构愿意往里投钱。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力就缺乏活力，缺乏创意。因此，在线教育一定要建成开放共享的平台。他建议最好开辟一个研究实验专区，给一线老师配备技术力量，专门用来给高校老师创新项目服务。

摘编自 科学网